

# 2005中国禹州钧窑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



大象出版社

# 2005 中国周村铜器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周村铜器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周村铜器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2005 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 编

大象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5 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编.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5347 - 4534 - 8

I. 2… II. ①河…②禹… III. 钧窑 - 瓷器 (考古) - 中国 - 学术会议 - 文集 IV. K876.3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5193 号

---

执行编辑: 方燕明 辛 革

责任编辑: 郭一凡

封面设计: 阳 光

出 版 社: 大象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编: 450002)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15.25 印张

印 数: 1 ~ 1500 册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 - 7 - 5347 - 4534 - 8

定价: 120.00 元

# 目 录

|                               |                       |
|-------------------------------|-----------------------|
| 前言 .....                      | 孙新民 (1)               |
| 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                | 耿宝昌 (3)               |
| 学术总结 .....                    | 李知宴 (4)               |
| 钩窑研究、发掘与分期新论 .....            | 秦大树 赵文军 (7)           |
| 禹州钧台窑的创烧历史 .....              | 赵青云 (39)              |
| 禹州钧台窑考古新发现与初步研究 .....         | 郭培育 (44)              |
| 浅谈故宫收藏的钧窑陈设瓷器的年代 .....        | 冯小琦 (51)              |
| 故宫旧藏传世宋钧窑瓷器——兼谈雍正仿均釉 .....    | 王健华 (58)              |
| 钧台窑“北宋钧窑”产品时代的再探讨 .....       | 陈克伦 (66)              |
| 钧台官钧瓷烧造时代考证 .....             | 陆明华 (71)              |
| 关于官窑类钧瓷器的制作年代 .....           | (日) 出川哲朗 著 陈 枫 译 (86) |
| 对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几处窖藏钧瓷时代问题的再认识 ..... | 杨爱玲 (92)              |
| 钧窑相关问题之我见 .....               | 张金伟 (96)              |
| 浅谈钧台窑的创烧年代 .....              | 毛杰英 (100)             |
| 唐钧釉的本质及其与后世分相乳光釉的关系 .....     | 刘凯民 苗锡锦 (103)         |
| 汝官瓷和钧官瓷起源关系的 PIXE 分析 .....    | 李国霞 赵维娟等 (109)        |
| 对于早期宋代天青钧瓷釉的初步探讨 .....        | 李欣营 (117)             |
| 试论钧瓷窑变艺术 .....                | 苗长强 张春伟 (128)         |
| 略论钧官窑的工艺创新 .....              | 丁建中 (133)             |
| 北宋双火膛钧窑柴烧原理初探 .....           | 马朝阳 李付彬 (136)         |
| 禹州茱庄唐代瓷窑群遗址的进一步考察 .....       | 徐华烽 李少颖 (139)         |
| 鹤壁窑钧瓷研究 .....                 | 王文强 (144)             |
| 延津县吴起城遗址金代陶瓷标本考略 .....        | 陈北朝 (152)             |
| 北宋京师自置官窑之谜探究 .....            | 殷德铭 (155)             |
| 禹州扒村窑及其装饰艺术 .....             | 李少颖 (170)             |
| 浅析扒村窑瓷绘中的花鸟类装饰 .....          | 王 雨 (177)             |
| 论扒村窑瓷绘艺术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渊源 .....    | 刘庆庆 (181)             |
| 当阳峪窑研究中几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        | 原雪辉 (187)             |

|                      |                   |
|----------------------|-------------------|
| 20 世纪传统钧瓷的发展概述 ..... | 熊云新 梅国建 (191)     |
| 对钧瓷恢复以来重要事件的回顾 ..... | 苗锡锦 (196)         |
| 论钧瓷 .....            | 白喜臣 (206)         |
| 钧瓷的鉴赏 .....          | 臧文莹 (208)         |
| 钧瓷的审美特征及其因素 .....    | 孔相卿 (210)         |
| 钧瓷文化传播及理论构建 .....    | 郭 雯 (212)         |
| 现代钧瓷的艺术风格与鉴赏 .....   | 冀德强 (217)         |
| 漫谈“黄金有价钧无价”的由来 ..... | 晋佩章 (219)         |
| 试析当前钧瓷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 | 李争鸣 (222)         |
| 如何处理钧瓷固本与创新的关系 ..... | 孔红生 (225)         |
| 传统与现代钧瓷艺术的关系 .....   | 米亚攀 (227)         |
| 关于钧瓷产业健康发展的思考 .....  | 张金伟 娄勇伟 李少颖 (230) |
| 后记 .....             | (239)             |

# 前 言

孙新民

钧窑属于北方青瓷系统，它成功烧制出的高温铜红釉，是对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一大贡献。钧台窑遗址位于今禹州市区北关的钧台与八卦洞附近，因靠近钧台而得名。禹州只是在金代大定二十四年（1184 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称为钧州，因此过去有学者认为钧窑始建于金代后期。1974 年，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对该窑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清理出窑炉、作坊等制瓷遗迹，出土了上千件瓷器标本。发掘者从窑址中发现了 1 件用瓷泥制作的“宣和元宝”钱范，据此推断，钧窑约始烧于北宋末年。

2004 年 4~9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禹州市区建设，再次对禹州钧台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 3000 平方米，清理宋代窑炉 4 座。出土瓷器种类繁多，既有唐代的黄釉瓷和花釉瓷器，也有宋元时期的钧釉瓷、豆青瓷、宋三彩和白地黑花瓷器。其中钧釉瓷器包括各类花盆、盆托、出戟尊、鼓钉洗、炉、盘、钵、碗等，以陈设类器物为大宗。釉色主要有天蓝、月白、紫红、碧蓝诸色，器表釉面上常留有蚯蚓走泥纹或开片，在花盆类器物底部刻有从 1 到 10 的阿拉伯数字。此次发掘进一步了解了钧台窑的制瓷历史，为确定钧窑瓷器的发展演变及其工艺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01 年 9~12 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我所联合对禹州市神垕镇的刘家门、河北地等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窑炉遗迹 8 座和石砌澄泥池 3 处，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物数千件，进一步确定了钧窑瓷器的烧制年代问题，被评为 2001 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经过初步整理，发掘者将刘家门等窑制瓷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唐代、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金代后期到元代初年和元代时期。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钧釉瓷器已经产生，主要生产小件器物，部分产品采用了裹足支烧的方法。钧釉产品釉层较薄，釉色淡雅匀净，少数器物上有大片的红彩，出现了内施天蓝釉、外施紫红釉的器物，比传世的陈设类钧瓷外壁的紫红釉显得浅淡而艳丽。

正是基于近年的考古新发现，禹州市委、市政府于 2004 年 10 月中国古陶瓷学会景德镇年会召开期间，提出申办 2005 年年会暨钧窑学术研讨会。经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会讨论，决定 2005 年不再召开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只召开两次专题学术研讨会，即 2005 年 7 月召开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出土辽金元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和 11 月召开的 2005 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为了筹备这次会议，2005 年 3 月 11~12 日，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莉英女士和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陈润民先生专程来禹，与禹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就前期准备工作及参观线路进行了专题商讨和实地考察。此后，河南省文物局陈爱兰局长和孙英民副局长曾多次过问会议筹备情况，禹州市委副书记唐

群喜、禹州市政府炊丽敏副市长、禹州市钧瓷研究所张金伟所长等也多次赴郑会面协商,并先后在禹州市召开过两次专题筹备会。禹州市委、市政府承担了全部会议经费,并动员一切力量确保会议的按时召开。

2005年11月23日至11月25日,由中国古陶瓷学会和河南省文物局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禹州市政府联合承办的“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如期在禹州市召开,来自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内地的学者100余人与会。这次研讨会为期3天,11月23日上午举行开幕式,(彩版一,1)由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袁南征主持,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耿宝昌、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禹州市委书记周庚寅先后致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报告大会筹备情况。开幕式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培育馆员向大会介绍了禹州神垕钧窑和禹州钧台窑的最新发掘成果,禹州市钧瓷研究所张金伟所长作了1:1复制宋代钧窑双火膛窑炉的主题发言。11月23日下午,与会代表参观禹州出土钧窑瓷器标本和观摩禹州市钧瓷研究所复制的宋代钧窑双火膛窑炉。(彩版二)11月24日全天进行大会研讨,与会代表主要对钧窑的起源、烧造历史、制作工艺和艺术成就,以及钧窑的发展与创新等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会议气氛热烈,畅所欲言。特别是在钧官窑的烧制年代问题上针锋相对,学术观点不一,大致有北宋说、金代说、元代说和元末明初说等多种意见,充分反映出中国陶瓷学界目前的认识水平和研究现状,也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松学术氛围。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钧官窑瓷器制作年代的早晚,并不影响它的官窑性质,钧窑的艺术成就和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11月25日,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禹州神垕下白峪钧窑遗址、禹州扒村瓷窑遗址和禹州神垕现代钧瓷制作工艺,并举行了大会闭幕式。(彩版一,2)闭幕式由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张浦生主持,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李知宴作学术总结,在禹州市政府市长张明山讲话后,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莉英致闭幕词,宣布大会圆满结束。通过实地考察窑址、观摩钧瓷标本、大会学术报告等热烈的讨论与交流,使此次学术研讨会达到了预期效果。

按照禹州市委、市政府承办此次研讨会的初衷,计划在会后出版钧窑研究论文集,以记录和反映目前陶瓷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感谢各位供稿的学者,他们按要求如期提交了论文。尤其是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出川哲朗先生,应邀寄来了他于2004年用日文发表的《关于官窑类钧瓷器的制作年代》一文,我们请人翻译后一并收入论文集,从中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于钧官窑瓷器烧造年代的认识。从收集到的稿件看,2005年的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学者们在考察了禹州钧窑最新的考古成果后,对一系列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尽管在钧官窑的烧制年代上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探讨的问题比过去更加深入,视野也较以往更加开阔。相信通过这些稿件的汇集出版,一定会对钧窑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关注禹州钧窑,期待着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面世。



# 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耿宝昌

2005 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经过周密筹备，于今日在宋代名窑的发祥地——禹州市召开，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盛会。

首先感谢河南省文物局、禹州市人民政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领导的关怀及同志们的努力工作。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意义重大。1974 年在禹县八卦洞钧台以及神垕，相继发现原宋代烧造名瓷的钧窑遗址和大量遗物，它同历代宫廷皇家保留下来的珍贵品宋代钧窑瓷完全相同，由此证明了历史文献及实物存在的历史事实。此早已有发掘报告公之于世，无可置疑。由于 2004 年在禹州制药厂旧址有新的发现，并出土了丰富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钧窑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因此，这次大会一定会开得很好，可以澄清长期以来有关钧窑产生时代的多种不确说法，是一次弘扬宋代钧瓷文化的科学论证会。

祝大会圆满成功！

# 学术总结

李知宴

2005 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从 11 月 23 日开幕到今天全部结束了。这次研讨会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专题讨论会，全部研讨的内容就是一个中心，即专门讨论钧窑问题。这是汪庆正会长领导下开展的重要革新：集中讨论某一重大课题，提高学术水平，力求参加会议的各位代表有充分的时间对问题展开讨论。学术上要有收获，明确提出问题，使大家感到会议结束以后还要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下去。虽然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集中在钧窑，但会议组织的内容相当丰富，每一位代表都可以就安排的活动在钧窑研讨会中的某一个方面得到启发，为自己寻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在会议进展过程中，有论文宣读或发掘成果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之后，紧接着就是参观科学发掘的标本。这次会议主办单位把有关钧窑历次发掘中的最典型的标本都拿出来，真是十分珍贵，十分难得。可以说报告条理清楚，有相当的深度，而且对发掘的重要标本看得非常实在。又比如，张金伟所长作的关于钧瓷烧成的论文，下午就看到双体窑炉用柴火烧钧瓷的现实操作，以及展出大量最新烧制成的灿烂夺目的作品，这样做大大提高了学术讨论会的科学性、客观性，实实在在地让各位参加会议的人从感性到理性都能有收获。在这次会上北京大学秦大树教授作了《钧窑发掘与研究的新收获》的报告。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它作为文化艺术最发达时代宋朝宫廷艺术的精品，以其铜红釉的发明及绚丽夺目的外观形象，把陶瓷美学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但钧窑也是让研究钧瓷的人们感到的困惑最多的。第一，宋元文献没有记载，明代前期的记载也没有可靠的东西。第二，有可靠纪年墓葬出土的东西长期以来没有看到。从社会上，大型博物馆看到钧瓷虽然不少，但要作编年或分期研究十分困难。秦大树教授对钧窑在文献中出现和受到赏识的过程分析非常清楚，让人耳目一新。论文中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钧窑陈设瓷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问题的提出和论点交锋的核心。秦大树的报告还详细介绍了 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1 月对神垕钧窑遗址进行的发掘和主要收获，他对钧窑的认识是“禹州市神垕西南部的古窑场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末期（北宋徽宗朝）”。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郭培育先生报告了 2004 年对禹州制药厂附近遗址的发掘，内容相当丰富。赵青云先生作了题为《禹县钧台窑的创烧历史》，介绍了钧台窑的概况、钧台窑之烧造、钧台官窑的形成，他的结论是钧窑出现在北宋初期，成熟于北宋中晚期。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副馆长陈克伦先生详细分析了钧官窑陈设艺术瓷的工艺特征、艺术成就，对一些陈设瓷标本进行了热释光测试，认为钧官窑中的艺术陈设瓷最早在元代晚期或明初，最晚也晚不过明初，它是官窑，是为宫廷生活需要而产生的，说它是元末明初并不影响这一部分瓷器的艺术价值、文物价值和经济价值。陆明华在《钧

台官窑烧造时代的考证》论文中，他沿着陈克伦先生的思路延伸下来，他的结论是钧窑有官窑和民窑之分，民窑比较早，钧官窑是什么时代，窑址发掘发现“宣和通宝”钱范，传世品中有“奉华”尊刻字，这些都不是钧官窑上限或下限的判断依据。它的造型和北宋、金都不符合，只有金华铁店窑有此类造型，金华铁店窑是元代瓷窑。再有“省府”字铭只在元典章中找到，所以钧官窑的时代为元代或明初。上海博物馆内科学测试年代为元末明初，这与它的历史发展规律基本符合；有的年代更晚，如孔雀绿釉鼓钉洗，才距今480年，已经晚到明代中期了。

李辉柄先生在发言中指出：研究钧窑要与它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宋代是官窑瓷器出现时期和民窑大发展的时期。官窑是非商品生产，民窑是面向民众。官钧的出现和北宋花石纲有关，作为宋徽宗宫廷点缀品，它与这种特殊的历史事件密不可分。李知宴在发言中认为光靠科学测试来断年代条件不成熟，从目前测试水平看，误差很大。北宋钧窑产品不仅仅窑址有，在白沙水库发现的一批北宋晚期墓葬群中也有一座同时代的墓出土了质量很高的钧瓷。明代中国瓷器生产中心已转移到景德镇，御窑厂设置，至少在洪武晚年已正常运转，生产出大量宫廷用的精美瓷器。而河南地区钧瓷生产完全已经衰落，没有能力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在河南窑址调查中，没有发现一座明代瓷窑能生产出钧官窑那样高水平的作品。对文献记载要具体分析，往往宫廷用瓷，士大夫知识分子写书写文章来记载，他们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就在笔记中写出。宋代钧官窑规模很小，合格的直接送皇宫廷，不合格的打碎后就地掩埋。比如安徽泾县窑五代生产高水平白瓷，是南唐官窑，但民国才有记载。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可能没有看到，明中叶已逐渐流向社会，故记载下来，才有所谓的文献。

教之忠先生指出发掘钧台窑不单纯出土钧官窑瓷器，同时还有临汝窑、扒村窑白釉黑花瓷器、青白瓷、汝窑瓷片等等，它们的时代很明确，如果钧官窑作品是元末明初，那么这些产品是什么时代的？也是元末明初的？天兴大战以后，河南陶瓷一蹶不振。景德镇兴起之后，一片衰落中的河南地区能出现一个生产水平如此高的官窑吗？

陈丽琼研究员指出这次讨论会发言热烈，畅所欲言。但不管怎么说，她认为把钧官窑定在北宋晚期为佳。因为同时发掘出土有青白瓷，不管窑口如何，但这些共生器物是北宋的。李国霞女士对汝窑、钧窑进行了X射线荧光分析，指出两窑配方中胎、釉的相同点和相异点，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知识。河南博物院的杨爱玲女士介绍了河南地区各地窖藏出土钧瓷的状况，瓷料极为丰富，为大家增进了很多的感性知识。

冯小琦以细腻的眼光对出土的几批钧瓷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分析，指出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王健华研究员明确表示故宫收藏的钧官窑作品是红釉瓷中水平最高的，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它就是宋代产品。明代的红釉瓷与它完全不一样。李宝平先生、嵯振西女士对热释光等方法测试提出了很有益的建议，特别是嵯振西研究员指出在年代问题上，对不同意见都要重视，要深入研究下去。李宝平先生介绍了国外许多测试工作的成就和出现的问题。

耿宝昌先生举了很多实例，指出北宋钧官窑瓷器重要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陈设瓷和日用瓷不能分开，在研究方法方面要独立自主，中国人的事中国人办，不要跟在洋人的后面做事。梅国建教授等编写了《二十世纪中国传统钧瓷》，他们的代表在会上详

细介绍了 20 世纪钧瓷的一些情况和有成就的艺人，这对研究近代钧瓷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精神非常可贵。

这次学术讨论会突出的特点是：

1. 讨论题目集中，看东西也很集中，讨论问题比较深入，因此收获也比较大。
2. 学术观点旗帜鲜明，观点对立，但热情洋溢，实事求是，相信会对钧瓷的深入研究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3. 实物标本的展示特别丰富，看得真实，思考钧瓷的问题很具体，一股学术研究的强大吸引力抓住大家，讲座的热情一直很高。这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禹州市政府付出的巨大辛劳，我们除了称赞他们以外，还要感谢他们。

我们相信中国古陶瓷学会的学术活动，一定会越办越好，为陶瓷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贡献。

# 钧窑研究、发掘与分期新论<sup>\*</sup>

秦大树 赵文军

钧窑瓷器是中国北方地区宋元时期一类十分重要的瓷器产品。人们在论及钧窑时，必称其为宋代的“五大名窑”，并认为其为宋代用于贡御的“官窑”瓷器<sup>[1]</sup>。因此历来为古陶瓷研究者们所关注。20世纪70年代末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一书，将以河南禹县为中心的一批生产天青釉钧瓷的窑场列为宋代的六大瓷系之一，同样给予钧窑极其重要的地位<sup>[2]</sup>。近年来开始对宋元时期的制瓷手工业进行区域性和阶段性的综合研究，钧窑瓷器又以其广泛的生产地域和巨大的产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sup>[3]</sup>。从艺术上讲，钧窑以雅致的乳浊状天青色釉和多彩的窑变而备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有效控制的铜红釉和铜红彩的应用，是钧窑对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一大贡献。

由于钧窑的重要地位，其研究备受人们的关注，又因为在长期的记述、流传中钧窑本身和其在文献记载中的地位发生过重要的变化，文献与考古发现多有冲突，因此成为近年来陶瓷考古与研究中的一个争议较多的焦点问题。为了解决学术争端，尤其是解决钧窑始烧时间和发展阶段的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1年秋季联合对钧窑的一组中心窑场，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河北地、下白峪等窑址进行了主动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继之，我们对出土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完成了刘家门窑址的发掘简报和分期研究<sup>[4]</sup>、下白峪窑址的发掘简报<sup>[5]</sup>。现将发掘和研究的主要收获报告如下。

## 一、发掘的缘起和经过

钧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瓷窑，同时，又是当今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疑问较多的一个窑口。比如，钧釉瓷器始烧于什么年代，钧窑在宋元时期的地位究竟如何，以及钧窑的产品到底有哪些等等。

### 1. 对钧窑的历史记载

考察古代的文献，宋元时期的文献中涉及的窑或瓷器种类很多，如对定窑、汝窑、官窑、越窑、龙泉窑、建窑、景德镇等当时较重要的制瓷传统均有记载，旁涉到的窑区亦有河北、唐、邓、耀州、萧县、瓯越等地区。唯有钧窑，作为宋元时生产区域至广，产量极大且首创铜红釉、彩的制瓷传统，却独无记述，令人不解。直到明初，仍然没有明确的关于钧窑的记载。明代初年最重要的比较系统地记录瓷器的著作《格古要论》<sup>[6]</sup>

<sup>\*</sup>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04BKG003）的资助。

和《碎金》<sup>[7]</sup>两书都没有记载钧窑。而被人们常常提及的《宣德鼎彝谱》一书,其中提到铸鼎彝的样式时曰:令“数目多寡,款式巨细,悉仿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照依原样勒限铸成……”<sup>[8]</sup>因而被很多人认为是最早关于钧窑的文献记载,可以早到明宣德三年(1428年)。然而,此书为后人托吕震之名的著述,其成书年代应该在嘉万时期<sup>[9]</sup>。由此可见,钧窑在宋元时期直至明初大体是默默无闻的。

对钧窑真正进行具体描述的文献始于明朝中期,首先出现在清赏类的著述和笔记类书中。目前所见较早的记载有成书于弘治甲子(十七年,1504年)的《宋氏家规部》,该书卷之四,“窑类条”下记:“钧州窑,注,深紫色者,粉青色带微紫者,质甚厚。”<sup>[10]</sup>另一部较早的文献为陆深的《俨山集》,该书卷九八《书·京中家书二十三首》记:“今寄回钧州缸一只,可盛吾家旧昆山石,却须令胡匠做一圆架座,朱红漆……钧州葵花水盂一付,又有菱花水底一个,可配作两付,以为文房之饰……”<sup>[11]</sup>

明代后期记载钧窑的文献材料还有张应文《清秘藏》,张谦德的《瓶花谱》,高濂所著《遵生八笺》,黄一正的《事物绀珠》,文震亨的《长物志》,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通雅》,董其昌的《筠轩清閤录》、《骨董十三说》,乔时敏于万历四十二年节录田艺衡著的《留青日札》六卷而成之《留留青》,等等。

这时的记载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清秘藏》对钧窑大体持肯定态度,《清秘藏》卷上,“论窑器”条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在记述以上五窑后曰:“均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均州窑之下有龙泉窑……”<sup>[12]</sup>将其列为宋五窑之后的第一位,描述亦中肯。第二类,以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为代表,该书中《燕闲清赏笺》将钧窑列名极后,并论其为除“种蒲盆”外,其他器物“俱以黄沙为坯,故气质粗厚不佳”<sup>[13]</sup>。大约从明代以后的文献记载中,开始指出钧窑是宋代的窑。如清朝前期佚名所著:《南窑笔记》中在描述钧窑时曰:“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奩、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骡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骨子粗黄泥色,底釉如淡牙色,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盖配合一副之记号也。釉水葱茜肥厚,光彩夺目。”<sup>[14]</sup>最后一句为其自创,表露了推崇之意,可视为对钧窑的一种溢美之辞。钧窑地位明显处于上升阶段。但从总体看,在清中期以前,记载评论大多较简略,也没有过多的溢美之辞。

从晚清开始,人们对钧窑大加推崇,甚至列为第一,如寂园叟陈浏所著《陶雅》卷上记“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曰均、曰汝、曰定、曰官、曰哥、曰龙泉、曰建……”<sup>[15]</sup>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民国以后,论者已将钧窑列为名窑之列,如清末民初人许之衡的《钦流斋说瓷》,“概说第一”记:“吾华制瓷可分为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其余各窑则统名之曰小窑。”<sup>[16]</sup>用名窑和小窑的方式区分名窑与一般窑口。不过,直到民国时期,人们并没有将钧窑直接称为宋代的五大名窑,而通常将钧窑与其他五六个窑一同并称为宋代的名窑。如吴仁敬、辛安潮于1934年刊布的《中国陶瓷史》中曰:“当时(宋代)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均等名窑。”<sup>[17]</sup>福开森校注明项元度《历代名瓷图谱》时指出:“宋钧窑双凤小尊

……此尊不知仿何款制成，或自创耳。然制度亦典雅而文。绝非俗工可辨，必名流所作也。夫钧窑之器在宋诸窑之下，而此尊式雅色佳，又为花器。当与定汝官哥诸器并驾齐驰矣。尊足下有五字号为数。”<sup>[18]</sup>这里一不提宋五窑概念，二认为钧窑在宋诸窑之下，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从上述情况可见，关于钧窑的记载是后世之人在收藏活动中逐渐发展形成的，从客观的记述，到将其定为宋代乃至北宋初期；从认为其为一个较普通的产品种类到不断提升其身价，但钧窑一直徘徊于“五大名窑”之门槛。看来，将钧窑推入五大名窑之中的临门一脚是由20世纪后半叶的学者完成的。至于将“汝官哥定钧”定为宋代的五大名窑是谁最先提出的，笔者尚不敢断言，1963年轻工业部组织编写的《中国的瓷器》一书<sup>[19]</sup>，1982年由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均谨慎地避开了五大名窑的提法。或许先出现于某些介绍性文章。不过，《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论及钧窑时，明确指出：“钧窑在后世被视作宋代五大名窑之一。”<sup>[20]</sup>从论述中看，20世纪后半叶的学者们的思路大体是，前人所说的柴汝官哥定五窑，将五代的柴窑去除后，钧窑在与龙泉窑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递补入五大名窑之列<sup>[21]</sup>。

钧窑之能够名列五大名窑，一个基本的依据是钧窑的陈设类瓷器是在北宋末年为宫廷烧制的。认为这类产品是因“花石纲”的需求或因营建“艮嶽”而生产的。即存在着“官钧窑”的概念。看来，这是建立在一个新近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的产物。本节的论述是想说明，对古代文献的利用应该有所判别，后世的记载，尤其是以收藏为目的的记载，并不能作为判断当时历史事实的依据，厘清文献发展的线索，认清一些观点的形成过程和原因，才能使我们对钧窑本身在其生产时期的客观历史地位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因为一、二条明清时期的文献记载，就作为判定宋元时期钧窑生产状况的不可动摇的依据，尤其是再加入一些感情因素，无视考古发现等客观事实的证据，那无疑将使我们的研究陷入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可悲境地。

## 2. 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钧窑的研究

由于有古代文献的记载，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一直坚守钧窑宋代说。尽管日本学者在20世纪前半叶就提出了钧窑始于金代之说<sup>[22]</sup>，50年代，陈万里、关松房等先生也曾提出过钧窑始烧于金代的观点<sup>[23]</sup>，但由于其主要依据钧州设立的时代和汝停钧代的论据，没有明确的考古依据，因此并未能产生较长远的影响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禹县和郟县发现了唐代的花瓷窑址，由于这些黑瓷上的彩斑主要呈蓝灰色和灰白色，与后来的钧釉瓷颇有相似之处，因此被称为唐钧。于是形成“钧窑始于唐，盛于宋。北宋徽宗时期成为御用珍品，并在禹州市东北隅古钧台附近设置官窑……”“靖康之变，宋室南迁，官钧窑停烧……到金元时代，钧瓷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样的“经典”观点<sup>[24]</sup>，迄今为许多学者所信守。然而，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并无可靠的证据证明钧釉瓷器始烧于宋代，目前所见有明确年代依据的考古材料最早的是金代的，而绝大多数都是元代的证据。尤其是元代，目前发现生产钧釉瓷的窑场达数百个，遍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等省区，完全不像一种为宫廷小规模生产的产品。另外，钧窑生产一类陈设用瓷，有各式花盆、各种盆托、出戟尊等等，主要是各类花器，并在底部刻印有数字。这类器物传统上被认为是宋代的产品，更有人认为是北宋末年徽宗朝花

石纲的产物,将这类陈设器与一般的钧釉器皿区分为所谓“官钧窑”和“民钧窑”。

然而,受文献影响不太大的西方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对钧窑,尤其是陈设类钧瓷的生产时代产生疑问,并根据这些陈设瓷的器形和厚重的胎体,将其生产时期排定在元末到明初<sup>[25]</sup>。这一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际上正被日益增加的人群所接受。

随着陶瓷考古与宋元明考古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被呈献给研究者。然而,人们却发现可以证明钧窑始烧于宋代的材料竟告阙如,目前大体可靠的考古材料只有一条,即洛阳发掘的北宋衙署中出土的一件钧窑洗<sup>[26]</sup>。近年来,关于钧窑始烧年代讨论的汉文论述接踵而至。李民举对钧窑陈设瓷进行了考证,认为其时代为元,甚至明初<sup>[27]</sup>。罗慧琪也对钧窑陈设瓷和钧台窑址花了大力进行整理排比,将陈设瓷的时代排定为14世纪晚期<sup>[28]</sup>。余佩瑾将钧瓷陈设类和器皿类器物作为两类器物分别进行排比,认为陈设瓷生产于14世纪前半叶,而器皿类器物则始烧于金代后期<sup>[29]</sup>。刘涛则将钧窑统一作为一个概念广泛收集了全国的考古材料,将钧窑的始烧时间定在金代前期<sup>[30]</sup>。这些论述中不乏精到的考证,又有考古材料的依据。然而其结论却与某些文献的记载和以往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许多学者难以接受,使钧窑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中颇具争议的一个学术焦点。

在古陶瓷研究领域,如何判定不同学术观点的正误,解决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矛盾,通过对窑址进行发掘来印证是最具有权威性的。日益增多的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和有强烈不同观点的两派意见,迫切地呼唤着新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成为我们对钧窑遗址进行一次认真的考古发掘的动因。2001年9月,为了弄清钧瓷创烧的时间和探讨钧窑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进程以及工艺发展的历史,解决学术界的有关争端和课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钧窑遗址进行了主动发掘。

由于出土有陈设类钧瓷,并且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禹州市钧台窑址,现已成为钧窑研究所的辖地,这块宝地已很难让人染指了,因此我们只能另寻他处。根据明《嘉靖钧州志》的记载:“窑,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下,瓦窑在州西禁沟左右。”<sup>[31]</sup>这是指出钧窑产地最早的文献材料,表明神垕镇西南部的窑场应是钧窑早期的中心窑场。20世纪60年代,故宫博物院曾对禹县的古窑址进行过相当全面的调查,指出神垕镇刘家门窑址的产品最精,时代最早<sup>[32]</sup>。许多多次前往禹县调查钧窑遗址的学者也告诉我们,多年来窑址所遭受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在目前条件尚允许的情况下,及时对神垕镇的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是十分必要的。否则,随着窑址的破坏,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就困难了,因此我们选定了这里作为发掘地点。钧窑考古队的田野考古工作自2001年9月始至2002年1月结束,总计三个多月的时间。

禹州位于河南省中部偏西的地区,地理上处于伏牛山余脉的浅山平原区。神垕镇又地处禹州市的西南角,进入了丘陵地带。在神垕镇的西南部,有一座较大的山从东北向西南绵亘于禹州与郃县交界处,称为大刘山,山的北坡下有一条小河自东向西流淌,地图上查不到河的名字,当地老乡称之为白峪河或倒流河,此河最终流入汝河。

禹州市神垕镇西南部的古代窑址是成组分布的一个瓷窑组群。在大刘山下,沿白峪



河旁分布,每隔一二华里就有一个窑址,各窑址一般范围不大,遗存的时代也比较单一。从早到晚延烧的窑址并不多。根据这一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对相距不远的4处窑址进行了发掘,分别为:刘家门东区窑址,刘家门西区窑址,河北地窑址和下白峪窑址。(图一)在四个地点总计开挖探方和探沟29个,发掘面积650平方米。发掘中清理窑炉遗迹8座,石砌澄泥池3座,灶1座以及窑前工作场所5处。出土了大批瓷器和窑具残片,总数约十余万片,其中可复原器物数千件<sup>[33]</sup>。在发掘中我们严格按田野考古学规程开展工作,发现的意义也比较大,因此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 二、发掘的主要收获

在本次发掘中我们严格按田野考古规范操作,工作认真、细致,因此发现清理的遗迹和遗物比较丰富。主要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果。

第一,本次发掘中清理出一批遗迹,重要的是发现清理的8座窑炉,其中5座保存相对完好。这5座窑炉分属不同时期,各具特点,在北方地区窑炉发展序列中都具有较独特的地位,为窑炉遗迹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如下白峪窑址中发现的中晚唐时期的窑炉采用了砖砌的建造方式,为砖砌浅火膛的窑炉,窑炉窄而长,由于窑炉是修建在河滩地上,在修建窑炉时,曾用河卵石对窑炉的基础做过特别的加工。(图二)以往在研究北方地区窑炉发展史时使用的几座唐代窑炉的例证均为非正式发掘的资料<sup>[34]</sup>,这座窑炉是少数正式发掘清理的唐代窑炉,与200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巩义黄冶窑清理的唐代窑炉的建筑方法和形制相同<sup>[35]</sup>,弥补了唐代窑炉研究的资料缺环。在刘家门西区发掘的四号窑炉是砖砌深火膛的窑炉。Y4的烧结部分厚达30多厘米,说明这座窑使用时的温度是非常高的。(图三)根据Y4的所在探方出土器物的情况,这座窑很可能是烧制白瓷的窑炉。这座窑炉的结构与1987年发掘河北磁县观台窑址清理的Y2~Y6一组窑炉的结构相同<sup>[36]</sup>,说明其为一座使用煤为燃料的窑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北地窑址清理的一号窑炉(HY1),其时代约在北宋晚期到金代,是一座土洞式长条形分室式窑炉。HY1残长12.92米,宽2.26米。窑室为长方形,中间以一道土石砌建的矮墙将窑室隔为前后室。(图四)在前、后室的南壁各开了3个添火孔,其中后室尾部的1号、2号添火孔尚保存有拱顶,以1号添火孔为例,长1.20米,宽0.88米,高0.35米。在窑底和添火孔中发现了大量的草木灰,证明HY1是以木柴为燃料的。在窑壁上涂抹有耐火泥,全部被烧结,局部被高温烧烤得流淌下来并呈瘤状,证明窑室内的温度相当高。窑尾部是一个圆形的大烟囱,以石砌小孔与窑室相连,烟囱的口径1.10米,内壁的烧结层厚0.06米,证明了烟囱内的温度也很高,应是此窑唯一的排烟道。HY1形制特殊,既不同于北方常见的馒头窑,也不同于南方流行的龙窑。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教授在了解了此窑的情况后,认为其在热功上是合理的。应该是从前到后依次生火烧制,这样有利于充分利用热能,提高烧成温度,是北方的窑工们借鉴南方龙窑的成功经验,结合北方的实际情况的一种尝试。我们在调查神屋镇茶叶沟蛤蟆坑窑址时也发现了两座类似的土洞式残窑。同样,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制药厂工程抢救发掘禹州市钧台窑址所清理的长方形窑炉